

诗逸轩文存

清逸



— 读史卷 —



詩逸軒

李零作品

待兔轩文存

——读史卷一——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待兔轩文存·读史卷 / 李零著. 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495-0426-8

I. ①待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上古史—中国—文集

IV. ①K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8703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三河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

三河市燕郊镇圣屯

开本: 960mm×1340mm 1/16

印张: 22.5 字数: 311千字

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我有个梦想的书屋，四面敞亮，一直在心中。真实的办公室呢，则是学校所赐，暂时借给我，地点在北大老化学楼的三层，挨着女厕所，很小。我刻了块匾，不好意思挂起来。

我说，北大有个临湖轩，我有个临厕轩。

“待兔轩”是我的斋号，命室之由见我的小书：《何枝可依》（《待兔轩读书记》的第一种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9年）。在那本书的自序中，我讲了个故事，这里不再废话。

我是个为兴趣而读书而写作的人，书是副产品。我从没想过读多少书才算合适，也从没想过写多少书才算合适。读书写书，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，玩哪儿算哪儿，不是为了学校，不是为了教育部，更不是为了他们的钱。

三十余年，弹指一挥间，我居然写了不少东西。本来就是加速度，缓慢上升，2000年后突然提速，和生理水平相反（我的记忆正加速流失），回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

以前写得少，名气小，出版难，不是主要原因。主要原因是，为了单位和学术界，为了领导和老同志，为了“媳妇熬成婆”，我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

后来，等我终于“熬成婆”，我觉得非常失落。为了会议，为了评审，为了各种固辞再三不得已的“红白喜事”，我还是一样身不由己。我问自己，难道你就这样下去吗？

早晨,到清华散步,站在王国维的纪念碑前,我常常想,陈寅恪说的“自由”到底是什么意思——“自由”不是白来的(The freedom is not free)。

我请人刻过一方印,印文是“小字白劳”。“零”的意思就是“白劳”。

“白劳”就是代价。

“白劳”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,学界并不例外。

当年,我在考古所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),年龄最轻,地位最低,当过小媳妇儿。我想告诉那些比我年轻的学者,当年的我,“白劳”是命中注定。

1976年底至1978年,考古所编《新出金文分域简目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),基础工作就两人,90%的卡片是我做的,10%的卡片是老刘(刘新光)做的,1978年底出版的那个油印本,我俩的名字还排在前面,但书印出来,却排在后面,排在“0%”后面。

1978-1981年,考古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84-1994年),我参加过最初的资料准备,书要一本一本对,拓片要一张一张找,除了室内整理,还要到各大博物馆拓铜器,我为此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,名没有,书没有,什么都没有。老刘说,你为这书付出那么多,别人装糊涂,我知道,留个纪念吧。她把她的《集成》送给了我。

1981年,我在西高泉挖秦墓,70多座墓,就三人,老卢(卢连成)、陈平和我。1982年,我在沔西挖西周遗址,也是跟他们在一起(还有郑文兰)。最后,我和陈平调走,老卢也离开了考古所。我的一切辛苦和劳累也“雨打风吹去”。

俞伟超先生知道我的经历。他说,你的时间并没白费,所得还是胜于所失。

真是这样吗?破涕为笑吧。

我调过两回工作,早就没有归属感,经历使然,教训深刻。我已看穿看透,与其“从一而终”,不如“移情别恋”。我才不死心塌地跟谁干,特别是有如“修

长城”的浩大工程和集体项目。

摧眉折腰,我不开心;呼奴使婢,也不乐意。最好的选择,还是自己领导自己。

我是单枪匹马惯了,喜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四面出击,其实只有一条枪。

杂文不谈了。学术,涉及三个界:考古、古文字、古文献。“三古”是基础学科,我重视,我喜欢,但对我来说,这是训练,不是目的,我更关心的是问题。三代无学科,问题并不属于哪个“古”。更何况,我是现代人,我的立足点还是现代。

三十多年来,跟着问题跑,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,我还涉及过很多行当,至少有五六种。研究《孙子》,涉及军事史;研究方术,涉及科技史和宗教史;研究简帛古书,涉及思想史;四出访古,涉及历史地理;研究文物,涉及考古和艺术史。虽然,这些行当,没有一行是我的“本职工作”,但不同领域的学者都还承认我。

人文学术,所有文科系,我都插过一脚。我甚至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艺术系教过书。

孙悟空语录:“超出三界外,不在五行中。”

我把这两句抄下来,挂在墙上。

他是中国的自由神。

书不在多。

一个诗人写一辈子诗,最后能有一首诗被人记住就不错了。

书也是这样。

但这需要以勤补拙,需要投入较多的精力。谁都只有一条命,我不比别人聪明。书都是逐渐写薄的,为了薄,先要厚,厚积才能薄发。

我是个按计划写作的人,单篇文章是为了编书,编书是想讲出点儿道理。其实,我做的一切,都只是铺垫,不管是自己铺路,还是为他人铺路。

研究学术,我是从文献整理入手。最初,我是拿《孙子》练手。这方面的文章已收入《〈孙子〉十三篇综合研究》(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)。

后来,我迷过一段古文字,深陷于拓片而不能自拔,没有一帮老同志帮忙拔,我还拔不出来。根儿都拔掉了,剩下的只是训练。

再后来,跑国外,我是靠方术屠宰时光。最初是写散稿,然后才汇编成书。《中国方术正考》、《中国方术续考》是这么写成的。翻译高罗佩的《中国古代房内考》,也是配合这一研究。

研究简帛,我也有个准备过程。比如写楚帛书,写郭店简,写上海简,我花费了不少时间。特别是上海简,很多精力都白费了,我很后悔。所幸,我还写了一本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》,这书是为了讲课。

我在学校讲经典,也是先讲后写。比如《丧家狗——我读〈论语〉》、《兵以诈立——我读〈孙子〉》,还有四本一套的《我们的经典》(已经印出三本),就是从课堂而来。

历史地理,我也写过一些文章,还没编。

访古,有不少日记和照片,也要整理。

考古和艺术史,我一直在写。老文章多已收入《入山与出塞》,新文章还没编;我还写过一本《铄古铸今》。

这些都是铺垫,为了我心中的学术。

本集所收,是我的学术论文,不是全部,只是上述集子(已编或待编)以外的散稿,侧重点是文史方面。我讲历史的文章,差不多都收进去了;文字方面也选了不少(不是全部)。

十年前,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过我的论文集:《李零自选集》,就是此书的基础。现在有所删削,有所增补,有所订正,分为两册,一册读史卷,一册说文卷。

这两册书,只是过河的石头。

语云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其实,就是圣贤,也不能不出错。过去,我说过一句大实话:“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。”(《花

间一壶酒》，北京：同心出版社，2005年，216页）

我也曾经年轻。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老想不明白，好些年纪一大把、头衔一大堆的人怎么也会犯错误，而且是最低级的错误。他不明白的道理，其实最简单，再大的学者也是人，是人都会犯错误。

人为什么会犯错误？这门学问可大了去。研究错误是一门大学问，报上说，国外有这门学问，国内则未之闻也。

错误，意必固我，是人都会犯。累，会犯；忙，会犯；年轻，有精力没经验，会犯；年老，有经验没精力，也会犯，怎么都会犯。光是生理、心理、气质、性格上的原因就有一大堆。记忆力差，思维跳跃，推理过度，联想失控，也是陷阱。

错误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，而且肯定是绝大部分。黄金不可能比沙子多。

我知道，我的书，错误一定很多。我不是精密仪器。

不犯错误不是人。机器才不犯错误（要犯也是跟着它的主人犯）。

错误分两种，一种是大错误，在总体认识上犯错误；一种是小错误，在字词、标点、引文等各种细节上犯错误。前者是探索性的错误，成亦萧何，败亦萧何，不一定能以对错论功过，如果它是为大问题当“靶子”，能以自己的失误，启发别人，引起争论，引起思考，很可能是成功之母、正确他爹。后者，一般叫“硬伤”，错就是错，不容商量。这样低级的错误，当然应尽量避免，却最不容易避免。

这次编书，我只对后者做一点订正，不做大修改。认识上的纠正，写在补记中，也只限非说不可、不说就可能误导读者的地方。我对别人的错误没兴趣，自己的错误也不想十步九回头，不断找补。无论大错误还是小错误，都只是当作一种认识过程来反省和检讨。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就让它付诸东流吧。

不过，有件事，我倒有点后悔，即过去发表的论文，脚注不周密、不统一，对读者查核原文不方便。这部分是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过程，部分

是因为我国的学术界原本就没规矩。刊物,吝惜版面,往往求简,有人甚至认为,脚注太繁是为了骗稿费。关于这方面的认识,我在《入山与出塞》(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4年)的后记中有详细讨论,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。

这是我的回顾与检讨,是为序。

2010年12月23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目 录

自 序 / 1

古书年代学

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 / 3

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 / 43

西周史

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 / 73

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 / 99

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 / 127

东周史

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 / 143

论秦田阡陌制度的复原及其形成线索 / 165

《商君书》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 / 181

楚国族源、世系的文字学证明 / 193

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 / 209

“三闾大夫”考 / 218

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(草稿) / 236

学术史

《管子》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 / 257

齐国兵学甲天下 / 268

《孙子兵法》 / 287

释“中人” / 306

道家与“帛书” / 308

说“黄老” / 316

道家与中国古代的“现代化” / 330

张政烺《马王堆帛书〈周易〉经传校读》整理后记 / 344

古
书
年
代
学

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

古书(这里指先秦古书和秦汉古书)年代的研究,是一项基础研究。它涉及古书的复杂成因,包含许多阐释学的奥秘,是个值得反复研究的问题。过去,疑古派曾对古书提出过普遍怀疑,可以说是人们对古书的一次全面反思,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整个认识。近年来,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古史研究的深入,人们对古书年代的看法正酝酿着一场变化。由于获取材料的近便,中国大陆的某些学者对这一变化已有强烈感受,例如李学勤先生即屡次为文,提出要对古书做“二次反思”¹。可是直到现在,许多人对这一变化却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(甚至毫无觉察)。所以,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,从它涉及的各个层面,做些初步的分析。

一 从“层累造成的古史”说起

研究古书的年代,本来应叫“古书年代学”。但长期以来,人们却往往把它同所谓“辨伪学”混在一起,这并不恰当(前者可包括后者,而后者不能包括前者)。中国传统的辨伪学,从方法上讲,主要是根据一种简单的推理:古书的题

¹ 李学勤《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》,《人文杂志》增刊《先秦史论文集》,1982年;《对古书的反思》,收入《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7年。

名作者应与古书的内容相符；而古书的内容既然是出自同一个题名作者，则它的各组成部分也应有同时性。符合这点的叫“真”，不符合这点的叫“伪”。这种推理在逻辑上似乎很严密，但它根据的却是汉魏以后的著作体例，放之先秦，则大谬不然。

近代以来的疑古派承袭古代的辨伪学而来。它的代表人物是“《古史辨》派”的领袖顾颉刚先生。顾先生不仅对前人的辨伪有系统总结²，而且还受到当时思潮的影响，从康有为和胡适等人那里汲取了灵感，喜欢用“托古改制”去解释“作伪动机”，并把古史的形成看作“故事演变”，因而提出他的“层累造成”说³。

顾先生无疑是近代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。虽然近代以来，除他所代表的那一派（主要是做辟除的工作），以罗、王为代表的另一派（更倾向于实证的研究）也有莫大影响。顾先生本人对这一派深表敬佩⁴。但即使是这一派，它的后继者也都受风气的感染，程度不等地接受了顾先生对古书和古史的基本估计。例如我们从郭沫若先生在其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附录中所说的话以及他后来写成的《金文所无考》（在《金文丛考》内）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

顾先生对古书年代的研究，我以为是有巨大功绩的。因为他集中了古人的各种疑点，把古书变成了理性思考的对象。虽然这类工作是以揭发“真伪”为出发点，它所使用的“真伪”概念有很大片面性（不受怀疑的恰恰是怀疑本身），但它把古书内容所包含的时代矛盾一层层剥离出来，这对纠正前人盲目以题名作者定古书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如果说，前人对这种矛盾的揭发往往是侧重于文句和词语的解释，那么顾先生就是有意要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的发生过程来做全面处理。这特别表现在他的“层累造成”说上。这一说法十分形象，因为考古学正是从地质学中借用了同样的概念来建立它的年代

2 参看顾颉刚《崔东壁遗书序》，见《崔东壁遗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。

3 参看杨向奎《论“古史辨派”》，收入所著《中国古代史论》，齐鲁书社，1983年。

4 见白寿彝《悼念顾颉刚先生》引顾先生的话，《历史研究》1981年第2期。

序列。这个概念只要略做修改(应称为“层累形成”),对于古书年代的研究还是很有用。

不过,对于顾先生,我们也没有必要曲护其短。我们应看到,疑古派在使古书成为理性思考的对象的同时,也因师心自用,造成许多流弊。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(一)疑古派对古史形成的复杂过程理解过于简单,以为其传述既出于年代较晚的古书,则必属后人造作,只能算是“伪古史、真神话”。从而把原有的古史系统一笔勾销,完全让位给考古学,形成“考古自考古,神话自神话”的局面⁵。这不仅曲解了古史的性质,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,对考古学也有不利影响(详后文)。

(二)把先秦古书的年代普遍拉后,往往把它们说成是刘歆伪造或更晚的伪造。这不仅对古书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曲解,而且对古书的流传和整理也是一种曲解,在目录学史和秦汉学术史的研究上也造成了一定的混乱。

(三)沿袭了经今文派对经古文派的偏见,曾把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等古文经本一概斥为伪作,这对信史的研究造成极大妨碍。《左传》对春秋史实和制度记载最为详尽,而《周礼》则是现存唯一系统讲古代典章制度的书。如果我们把这两部书否定掉,那么不仅现在的东周史会出现很大空白,而且更重要的是,我们还失去了向上做进一步追溯的起点。因为没有晚期“制度史”的知识作“模拟系统”和“参照物”,我们将不可能使支撑商代、西周史的考古资料“开口讲话”,也不可能把当时的古文字材料串连成一种有框架可以范围的史料。

对上述流弊从方法上进行检讨,我们将不难发现,它往往是把古书本身的年代与古书内容的年代混为一谈,对古书形成的漫长过程也只取其晚而不取其早。这种偏颇,由多方面的误解所造成(下面还要讲)。它实际上是把“层累造成”理解成“层累作伪”。

当然,这里应当补充一点,就是顾先生本人在晚年对他早期的提法已有

5 参看张光直《中国青铜时代》,三联书店,1983年,251—253页。

许多修正,例如他对《周礼》时代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⁶;而参加过“《古史辨》派”论战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吕思勉先生于40年代也曾批评说:“近二十年来,所谓‘疑古’之风大盛,学者每訾古书之不可信,其实古书自有其读法,今之疑古者,每援后世书籍之体例,訾议古书,适见其卤莽灭裂耳。”⁷现在像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那种相当极端的看法(认为刘歆不但伪造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,而且遍伪群经;不但遍伪群经,还旁及诸子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,伪造古文和鼎彝文字)已经很少有人相信,大家都已承认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是先秦古书。但是这里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对疑古派所提出的看法作重新认识呢?原因就在于它背后有一个很系统的想法,而这个想法已形成古史研究的心理定势。例如顾先生虽然现在是把《周礼》定为战国时期齐国的作品,但他论证的方法却没有改变,仍然是要找出一种“思想运动”作为造作之由;而吕先生虽然对古书有较为公允的评价,但他也还是强调治古史必“以今文为主”,认为古文之学后起,不如今文更有来头⁸。

总之,现在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绝非局部可以消除。它等于是给古史研究装了一个“过滤器”,任何古书在使用前都要经过它的“过滤”。例如张心澂先生编过一部《伪书通考》,几乎把所有古书都收在里面,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典型。如果我们无视这个“过滤器”,就会被认为“犯规”。

二 出土简帛书籍与古书体例的研究

简帛书籍是什么?顾名思义,当然是指写在简帛上面的东西。但这里我们必须把书籍的含义也限定一下。

对于历史研究,特别是社会史的研究,档案要比一般图书更重要。但不幸

6 顾颉刚《“周公制礼”的传说和〈周官〉一书的出现》,《文史》第6辑,1979年。

7 吕思勉《先秦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年,6页。

8 吕思勉《先秦史》,8页。